

曲阳出土石造像铭文中的数量词小考

刘青

曲阳县文物保管所，河北 保定 073100

摘 要： 1953年10月9日，在曲阳县小南关村修德寺遗址发现了石佛造像，共出土造像及残件2000余件，有明确纪年者达300余件，不但载有时间、地点、佛像名称、造像者、发愿目的等内容，绝大多数还记有造像数量。曲阳造像铭文中的“一区”“一铺”“一所”造像就是一件、一座造像，一般与本件造像中的佛的数量无关。近现代人称每件造像为“座”“尊”或“件”，但在北魏后期至唐早期的230年中大多称每件造像为“區”或“軀”。

关 键 词： 石佛造像；铭文

A brief Examination of Quantifiers in the inscriptions of Quyang Earth-Stone Statues

Liu Qing

Quyang County Museum of Cultural Relics, Baoding, Hebei 073100

Abstract： On October 9, 1953, stone Buddha statues were discovered at the site of Xiude Temple in Xiaonanguan village, Quyang County. More than 2000 statues and remnants were unearthed, and more than 300 were clearly dated, which not only contained the time, place, name of Buddha statue, statue maker, votionmaking purpose and other contents, but also recorded the number of statues. The "one district", "one shop" and "one statue" in the inscription of Quyang Statue are one or one statue, which generally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number of Buddhas in this statue. In modern times, each statue is called "seat", "respect" or "piece", but in the late Northern Wei Dynasty to the early Tang Dynasty, most of the 230 years, each statue is called "district" or "body".

Keywords： stone Buddha statue; inscription

1953年10月9日，在曲阳县小南关村修德寺遗址发现了石佛造像。由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和河北省文化局对此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共出土造像及残件2000余件。在这批造像中，有明确纪年者达271件。之后又在修德寺附近发现有纪年白石造像30余件。这300余件造像的发愿文不但载有时间、地点、佛像名称、造像者、发愿目的等内容，绝大多数还记有造像数量，现对其中涉及的数量词略加考释。由于作者才疏学浅，不当之处，还请大家指教。

在300余件有明确纪年的造像中，大多记有造像的数和量。数词是表示数的词。量词是表示人、事物、动作的单位的词，经常与数词一块用。数量词是汉语言文字中使用最频繁的词类之一。据统计（字迹不清晰的除外），造像量词中，用“區”的有110件，用“匚”的22件，用“匚”的8件，用“匚”的7件，用“匚”的2件，用“匚”的1件；用“軀”的30件；用“軀”的22件；用“軀”“軀”的各4件；用“軀”的2件；还有用“軀”“軀”“軀”“軀”的各一件；另有用“所”的一件，用“鋪”的2件。每件造像所用数词绝大多数为“一”，也有少量用“二”“两”的。但有不到十件，未标明数和量，只标有造像名称。如：“孝昌二年四月廿一日，比丘昙宗、昙庆敬造释迦像各为师僧父母法界众生同共供养侍佛时”，“天统四年十二月廿九日弟子刘遵伯……造弥陀玉像观音大势二菩萨……”。也有个别另标注为造像，如“开皇廿年仁寿元年正月十五日正女佛弟子敬造玉像”。

根据以上统计，并结合内容具体分析，似乎能得出以下结论：

一、造像铭文中的数词

在北魏至东魏绝大多数为单体造像^[1]，也有少数为“一铺双尊”和“一铺三尊”的，到了北齐至隋，除单身造像外，像式上流行双身像，不但有双思维，双菩萨，还有双佛像。

在300余件刻有发愿文的造像中，铭文中数量词有用“一区”（用“軀”等字的为同义，在此只用“区”）、“一铺”“一

所”“二区”、“八区”的，据统计，铭文中数词用“一”的包括：造像为一主尊的有141件，一主尊两胁侍的有17件，两主尊的有95件；对一区多尊的有的标明了尊数，如：“天保四年十月廿八日韩阿妃……敬造双观音像一区……”“开皇十四年七月十五日刘士则……造双思维像一区……”“天保六年正月廿三日上曲阳人李神景兄弟等……敬造白玉无量寿像一区并二菩萨”（图一）。用“两区”的共四件，如：北魏正光元年造像（图二）背面刻发

愿文：“武定元年九月八日清信女王女仁兴心造记父母生存之日正光元年中造像两区释迦观音为国祚永康三宝长延兄弟 妹亡者归真现存得福亲罗蒙润眷属得济一切含生普得善愿一时成佛。”此为单身造像，不可能为两区，发愿文系后人追记。说明王女仁造像非此一件；唐显庆二年造像（图三），刻发愿文：“显庆二年六月八日比丘尼张惠观奉为皇帝及师僧父母法界含灵敬造多宝释迦像二軀虔心供养比丘尼孙皆念供养观门徒惠藏惠常等供养。”此像为双尊造像，但从发愿文分析此中的“二軀”可能并非只指此一件造像。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曲阳造像铭文中的“一区”“一铺”“一所”造像就是一件、一座造像，一般与本件造像中的佛的数量无关。但我们近期在民间征集到石造像残件（图四—七），其发愿文为：“天保□□□□戊九月甲申朔四日□□□信土（士）佛弟子阎□□弟等敬造玉像八区上为皇帝陛下有（又）为七世先忘（亡）见存内亲有（又）为居□眷属有生之类法界众生居时成佛。”从残存的四个椭圆形莲台看应为双面造像，每面四尊。则可以理解为“八区”是指此件造像上的“八主尊”之意，所以不能排除极个别有把“一铺多尊”的造像称为多区的情况。

二、对造像“量”的称谓。

近现代人称每件造像为“尊”“尊”或“件”，但在北魏后至唐早期的230年中大多称每件造像为“區”或“軀”，《康熙字典》释：“軀，區也。是众名之大^[2]，若区域也。”《汉语大词典》释軀：“塑像单位，犹言尊、座。”原位于灵寿县幽居寺赵郡王高叡造阿闍佛像基座正面刻发愿文：“大齐天保七年（556年）岁次丙子闰月癸巳十五日丁亥，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定州诸军事、抚军将军、仪同三司、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赵郡王高叡，自为己身并妃郑，及一切有形之类，敬造白石阿闍像一區。”此寺为皇家所造寺院，造像记所用文字应非常规范。2006年4月在河北省南官市后底阁村发现200多件佛教白石造像残件，其中韩善行队下五十人等造坐佛像通体残高72.5厘米，方形基座，四面阴刻造像记400余字。其中有“唯大唐调露元年（679年）十月八日大像主宣勇师上柱国韩善行队下五十人等奉敕东征敬造弥陀像一軀并二菩萨上为天皇天后下为七世先亡都维那上骑都尉韩容仁维那上□军信政上柱国张文遇轻车张弘道（以下均为职位及人名）……”韩善行及队下五十人在当时都有一定地位，非平民百姓，造像记所用文字当为当时的官方文字。由此可以看出，佛教石刻造像盛形于北朝至唐^[3]，对雕刻称“區”或“軀”是当时广大区域通行的习惯。如《文物》2016.4期刊发的《甘肃泾川佛教遗址2013年发掘简报》中称：出土石、泥质佛教造像46件，其中北周天和六年（571年）立佛造像发愿文记有：“天和六年岁次辛卯四月戊寅朔十七日甲午佛弟子毕僧赞自村胥□难居翹思惠日故割衣食之资敬造释迦牟尼像一区，伏愿寿命……”“軀”应为“區”的本字^[4]。而“區”与“軀”同，可能“區”易写，用的就多了些。

而“𠩺、𠩻、𠩼、𠩽”，应为“區”字的变体字。至于“匚”应为“區”字简写；从“堰、礪、樞、璫、嶠、偏、樞、驪、匱、”等字的结构分析，“堰、礪、樞、璫、嶠”是在“區”字基础上，又加了偏旁，“土、石、玉、山”说明当时的造像有

陶、石、玉、木等材质；而“僵”“握”可能与人体造像和由人制作有关^[5]。至于“驅”“𠂔”之意不好推测。总之，这些字可能为当时的变体字、古体字、俗体字或伪字。但不是官方所通用的，这也说明当时曲阳修德寺造像的民间性特点^[6]。

到了唐代出现了“所”“鋪”“堂”的称谓,《辞源》释“所”:量词,计房屋之数。“鋪”则用在炕或床方面作量词的^[7]。而在唐代亦用做造像量词使用^[8]。由于唐代社会稳定,手工业发达,人们的文化水平比南北朝时有很大提高,除有意纠正南北朝随意变更笔划的习气而提倡正字样的措施外,印刷术的广泛应用^[9],也收到了正字功能,才使得字形少变化,而趋于一定^[10]。做为造像的量词“軀、區”依然使用,而南北朝时奇形怪状的“區”字已经消失。



> 图1



> 图2



> 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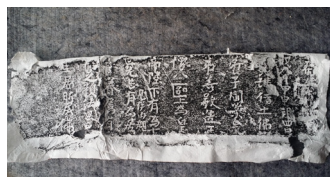
> 图4



> 图5



> 图6



> 图7

参考文献

- [1] 胡国强. 玉石梵像——故宫藏曲阳造像[J]. 读者欣赏, 2016.
- [2] 达微佳. 曲阳造像中的思维像[J]. 紫禁城, 2015(7):8.DOI:CNKI:SUN:ZJJC.0.2015-07-018.
- [3] 张保珍. 河北曲阳佛教造像地域风格研究[D]. 南京艺术学院, 2014.
- [4] 王丽敏, 魏敏. 曲阳县出土的两件彩绘造像[J]. 文物春秋, 2003(3):63-63. DOI: 10.3969/j.issn.1003-6555.2003.03.015.
- [5] 故宫博物院. 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佛教造像[J]. 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 2011.
- [6] 王景勇. 曲阳修德寺塔出土木雕佛像保护修复[C]//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第九次学术年会论文集. 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 2016.
- [7] 戴东方. 试释江苏淮安出土的东魏造像碑[J]. 艺苑(美术版), 1995.DOI:CNKI:SUN:NJYS.0.1995-03-014.
- [8] 李晔. 北朝佛教美术——河北曲阳菩萨造像探源[J]. 美与时代: 美术学刊(中), 2018(7):2.DOI:CNKI:SUN:MSDZ.0.2018-07-061.
- [9] 郭洪义. 《曲阳白石造像研究》释文校补[J].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4, 33(10):6. DOI: 10.3969/j.issn.1672-612X.2014.10.021.
- [10] 贾朋. 试谈两件郛城佛寺遗址出土背屏式白石造像的特征与工艺[J].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21, 200(005):33-35.